

# 现代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困境与出路

陆欣,王佳棋

(长春大学 公共外语教研部,吉林 长春 130000)

[摘要] 古代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发展相对迟缓,载体论是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涉及内容广泛,思想内涵丰富,但理论脉络较为模糊;近现代西方的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折射出泛化的学术倾向。此一时期中国的文学语言研究深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有忽略自身传统的学术盲动的趋向。无论是中西方,新时期的文学语言研究都有必要进行综合性的学科建设和整合,使其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

[关键词] 文学;语言研究;综合性研究;学科整合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4)01-0102-04

文学语言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自身独特的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语言研究要想取得更大、更健康的发展首先是要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导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学者们一方面应该大力继承和挖掘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学术思想和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应该避免学术盲从和泛化的倾向;其次,要注重学科的整合和定位。文学语言研究学科的整合和定位既要在现代语言学、语言哲学的指导下进行,又要注意到其跨学科的性质。只有这样,文学语言研究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继续前进并取得更大的发展。

## 一、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和局限

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从古希腊至今,西方文学语言研究大致经历了载体论、本体论以及客体论三大阶段。所谓载体论,就是把语言看成是表达文学作品的工具,相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来讲,语言是处于一种附属的、次要的地位,是表达思想或内容的媒介<sup>[1]</sup>。载体论文学语言观持续了两千多年,在西方文论中一直占有主导性的

地位,直到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学语言学派的出现,此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语言载体和媒介的地位。形式主义学者们认为,语言是衡量文学“文学性”的唯一标准,是语言形式决定了文学的内容而不是相反。形式主义理论彻底改变了语言在文学作品研究中的附属地位,使语言成为文学作品研究的本体。形式主义理论学家托马舍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词语通常是传递信息的手段,具有交际功能,而文学作品则不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表达艺术,特别注意语词的选择和搭配,……这就使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本体的价值”<sup>[2]</sup>。形式主义学派的出现标志着文学语言研究从载体论过渡到了本体论,是西方文学语言研究两千多年来第一个质的突破。

紧随本体论之后,文学语言客体论又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该派理论将文学作品的受众,即读者,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文学文本和语言看作是为了读者的阅读和理解而存在的客体对象。关于文学语言客体论,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的论述比较有代表性,英加登指出:文学作

[收稿日期] 2013-11-11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吉教科文验字[2011]第198号);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B210)。

[作者简介] 陆欣(1966—),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副教授;王佳棋(1975—),女,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公共外语教研部副教授。

品的语言结构只有一部分表层的属性由客体自身呈现出来,更加深层的属性则必须由读者的想象力加以建构<sup>[3]</sup>。

相对于西方文论,中国古代的文论家们对文学语言的考察显得更为细腻和具体,内容更为丰富,思想更加深刻,例如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论述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易传·系辞》在论述卦象的过程中阐述了著名的“言、象、意”理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魏代的王弼进一步加以补充,提出了“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这样的观点<sup>[4]</sup>。中国古代的文论家和散文诗歌大家们极力推崇寓言以及比兴等手法,因为只有通过“立象”的方法才能向世人昭示深刻的宇宙人生哲理。从这一点来看,“立象”是文学艺术语言的最高境界。这与现代西方海德格尔的思想颇为相似,海德格尔认为哲学真理既不是日常语言所能触及的,也不是人为的逻辑语言所能达到的,只有诗性语言才有可能通向哲学真理的正确途径<sup>[5]</sup>,由此,他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样的著名的观点。

通过对比可以得出结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西方文学语言理论发展相对缓慢,近代以来加快了脚步,长于理论建设,逻辑较为明晰。中国古典文学语言理论具体内涵丰富,思想底蕴深厚,但缺乏理论和逻辑上的传承。

## 二、近现代中西文学语言研究面临的困境

近现代以来,随着欧美分析哲学的深入以及欧洲大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哲学研究开始出现“语言转向”。在哲学研究语言转向的大背景下,涌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语言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索绪尔、塞尔、乔姆斯基等人。1916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学与哲学的正式分离,从此,人类对语言科学的研究步入了快车道。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经指出:“语言科学的发展和重要性完全可以跟17世纪伽利略改变了我们关于物质世界的整个观念的新科学相媲美。”<sup>[6]</sup>

20世纪以来,伴随着哲学和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推陈出新,西方文学语言研究渐入高潮。紧随着俄国的形式主义学派,先后又出现了新批评学派、结构主义学派、接受美学学派、解构主义学派等本体论学派,可以说每一个新出现的

学派都是对以前学派的反动和创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本体论研究逐渐走到了尽头,于是又出现了以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客体论学派,这些学派把研究的视角重新又转向语言以外的社会现实,把文学语言的研究重新与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外部因素相结合。总的来看,20世纪西方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一种百家争鸣、欣欣向荣的局面。

在这一历史时期,反观中国文学语言的研究却出现了西化倾向严重,缺乏创新的局面。出现这种颓局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西学东渐带来的直接后果。近代以来,出于强国富民的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积极探索和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以期改变中国愚钝落后的社会现实。可是,片面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直接的负面后果就是矫枉过正,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在文学语言研究领域亦是如此,百年以来鲜有自己的创新。其二是对本国研究历史和传统的否定。割断和否定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特色是全盘西化倾向所导致的间接后果。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文论的研究既面临着与国际接轨、融入国际研究大背景的任务,又面临着恢复自己的研究传统,推陈出新的严峻挑战。

20世纪中国文论的研究陷入了迟滞的、盲目跟进的状态,那么,是不是说西方那种大发展、大繁荣的状态就全无问题了呢?其实也不尽然。纵观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整个西方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各种学术流派和思潮此起彼伏,给人一种表面上的欣欣向荣的印象。实际上,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折射出的是一种理论创新上的浮躁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过度强烈的“言说欲”和“表现欲”。在标新立异思想驱动下走马灯似的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很有可能给学术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因为学术的发展十分需要理性的通盘思考和谋划,而“言说欲”和“表现欲”则是以满足自身为目的的,并不或很少考虑学术发展的整体需要,这很有可能干扰或阻碍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sup>[7]</sup>。

以标新立异为目的的学术研究很可能会使文学语言研究陷入僵局,原因之一是非理性的理论创新具有盲动性的特征,这样的理论创新往往很难深入下去,常常是一个观点刚刚提出就被另外的观点所取代;原因之二是浮躁的学术研究多半带有“排斥他人”的学术情结,各家各派都倾向于以自己的理论观点为核心,忽视或排斥其他理

论的合理因素和内核,或在主观上就对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采取一种先入为主的抵触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有可能使研究陷入不可自拔的僵局,脱离正常健康的学术轨道。实际上,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文论研究包括文学语言研究已经开始陷入这种学术乱象之中。韦勒克就曾指出:“由于方法上的冲突,我们的文学语言研究一直呈现出一种分崩离析的状态……”<sup>[8]</sup>。

分析近现代一个多世纪的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中西方的文学语言研究实际上都是处于比较极端的状态之下。中国近现代文学语言研究缺乏理论上的创新,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跟着西方的理论在转,许多研究者认为,凡是新出现的和新引进的必定是合理的和先进的,还有许多研究者是以西方的文学语言理论来解释和硬套中国文学的现实;与中国情况相反的是,西方近现代文学语言理论是过分关注理论上的“创新”,急于阐发自己的新观点,从而导致整个文学语言理论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近现代的文学语言研究都陷入了某种程度上的困境。

### 三、文学语言研究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从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都需要从哲学、语言学、文艺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充分地吸取养分,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既不能像以往那样走标新立异的老路,也不能割断与历史传统的联系。

对文学语言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应该以正确的哲学方法论为指导。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综合是在分析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才开始的,它包含和整合了分析阶段中所取得的全部成果,它是丰富的总体,是多样性的统一,是思维过程中最高级的阶段<sup>[9]</sup>。我们之所以强调要对文学语言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是因为中西文学语言研究历经从古至今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具体的分析,这些分析不经综合就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产生质的飞跃。

在进行综合研究的过程中视野要尽可能的开阔,要综合利用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所创造的的全部的相关的理论成果,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西方的文学语言研究,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语言研究长于理论建设,此期间的理论成果最丰富、最集中、最有创意,很值得各国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的借鉴。

可以充分利用和对比西方的理论优势对中国古典文论进行梳理和评价,借以延续和拓展中国文学语言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理论脉络。借鉴和参考西方的语言研究理论并不是要像以往那样简单地以西方的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事实,而是要探寻双方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理清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次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综合<sup>[10]</sup>,例如,在研究孔子的“文质论”时就可以将视野投向西方的相关理论,挖掘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会发现“文质论”既不同于载体论,也不同于主体论或客体论,它强调的是在创作的过程中,要实现作品语言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可以称之为“形式内容统一论”。

实际上,西方一些学者早就意识到了综合研究的重要性,很是注重吸收和借鉴东方的古典文化成果,如海德格尔十分注意吸取中国道家的哲学思想,道家哲学对“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论述与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德里达对汉字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萨丕尔对汉语语言的节奏和美学特性大加赞扬。

在综合研究的过程中,第二个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是要实现研究传统的回归与继承。任何优秀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的,只有立足于本民族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才能真正走向世界。中国古典文论是一个十分广大而富饶的领域,极具民族文化特色,亟待我们去研究开发和继承。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有关诗歌语言的理论最为发达,产生过大量有关诗性语言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西方古典文论无法企及的,仅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有很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闪耀着思想光辉的理论观点。例如,《论语》中有“不学诗,无以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情欲信,辞欲巧”这样的论述;《道德经》中有“大言希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中有“言不尽意,得意忘言”;《墨子·非命》中有“先质而后文”;《孟子·公孙丑上》中有“知言养气”等。先秦诸子的论述有些虽不专指诗性语言,但对后世诗歌创作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和深入研究。

除综合研究外,中西方文学语言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加强学科的整合以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有些学者,如王汶成<sup>[11]</sup>等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正尝试着将20世纪的文学语言研究划分为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认为形式主

义、新批评学派以及结构主义学派主要运用的都是语言学的方法,也就是说在考察和研究文学语言的时候主要是以文学作品的语言和文本为研究的本体和对象,不涉及其他,如形式主义重点考察的是文学语言和文本异于日常语言的特征;结构主义关注文学语言在聚合和组合关系上异于其他语言的特征。非语言学方法的学派包括接受美学、文学解释学、社会历史学派以及女权学派等。这些学派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的语言与语言之外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如接受美学和文学解释学强调的是文学语言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社会历史学派关注的是文学语言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关系。

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文学语言研究进行整合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本研究认为将文学语言研究划分为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似乎稍显繁琐,且在逻辑上有自相矛盾之嫌。我们的观点是尽量做到理论简化,取消语言学方法和非语言学方法之对立,可以将文学语言研究纳入到语言学科里来进行。因为近几十年来语言学科发展迅速,已然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语言学科已然实现了与哲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足以为文学语言研究提供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sup>[12]</sup>。反过来看,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又可以更好地促进语言学科的发展。例如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语言属于特定的语域,从篇章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语言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主流的体裁,文学语篇之间具有主体间性和互文性,如能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文学语言研究进行整合,则无疑是对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事实上,将文学语言研究并入到语言学领域具有广

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完全可以将其命名为文学语言学,使之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除可以与语言学科进行整合外,文学语言研究还可以实现与很多其他学科,如美学、社会文化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的整合,从而建立起更多的交叉性的分支学科。学科的整合将更加有利于文学语言研究科学合理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 杨周翰,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21-24.
- [2] [俄]托马舍夫斯基. 艺术语与实用语[A]. 俄国形式主义论文选[C]. 方珊, 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83.
- [3] [波兰]罗曼·英加登. 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 陈燕谷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304.
- [4] 楼宇烈. 王弼集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609.
- [5] [德]海德格尔. 人, 诗意地安居[M]. 郇元宝译. 上海: 远东出版社, 1995: 99-111.
- [6] 伍铁平.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M]. 北京: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2.
- [7] 王汶成. 西方 20 世纪文论中的文学语言研究述评[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4): 67-76.
- [8] [美]韦勒克. 批评的诸种概念[M]. 丁泓, 等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 264.
- [9] 斯大林. 斯大林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527.
- [10] 绪可望, 杨忠. 客观主义、经验现实主义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语言观比较研究[J]. 外语学刊, 2012(1): 11-14.
- [11] 王汶成. 文学及其语言[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7, 133.
- [12] 绪可望. 个性与共性视角下的“字本位”理论[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125-129.

##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Language

LU Xin, WANG Jia-qi

(Department of General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and Research, Changchu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00,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time,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Western literary language study is comparatively slow and the carrier theory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theory among some others. During this time,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study covers a wide range of contents and with deep philosophical thinking, but is not as logically clear as Western theories. Entering the modern time,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study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and turn to neglect its own academic tradition while Western literary language study tends to flourish. By the contrastive study, we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in the new era, both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ry language study should undertake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study and subject integration.

**Key words:** Literary; Language Study; Comprehensive Study; Subject Integration

[责任编辑: 张树武]